

“博物馆里读中国”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汲古高歌——恭王府博物馆藏溥心畲画稿研究展”于4月23日至7月21日在恭王府乐道堂展厅展出。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主办。



展览以恭王府博物馆对特色馆藏溥心畲画稿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关联本馆及梅兰芳纪念馆、湖南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所藏溥心畲完整绘画作品，对研究成果所揭示的有关“继承—创造”的自觉和方法进行深入解读和展示，旨在为公众带来一次具有较高学术性的美育体验，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继承和创新性转化方面提供启示。

展览利用恭王府传统古建筑院落空间特点，以“院落序厅+三个单元”的展示结构展开。主标题取自溥心畲所书集唐诗联“汲古得修绠”“高歌披心胸”两句，指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创新发展的关系。

在春夏之际的乐道堂院落中设置的展览序厅，将观众带入一个由古建筑、花木和展览装置等营造的意象空间，前言、溥心畲生平简介、艺术简表、展品目录等图文展板和溥心畲常用印文互动装置等帮助观众了解溥心畲和相关传统艺术知识，建立与展览主题的联系。

步入正殿，是展览第一单元“胸有成竹——溥心畲绘画生成过程中的画稿”。在绘画过程中，画稿在画材形象、组织结构、章法布局以及画面意蕴表现等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是画家表达心胸、学养，是古人、自然与自我等因素综合处理过程的思维痕迹。该单元重点通过溥心畲画稿与其完整作品的分组展示和分析，用直观的方式介绍溥心畲画与稿之间的关系，画稿绘画生成过程中蕴含的多种形态、功用等。

夕阳红树轴 溥心畲 首都博物馆藏(图1)《夕阳红树轴》是目前所见溥心畲最早的山水画作品，由溥心畲17岁(1912年)在西山戒台寺读书、初习作画时所作。溥心畲在他的《学庸自述》中，将自己学画的过程描述为根据其丰富的家藏，习久而“渐通其道，悟其理蕴”。江山楼阁图 溥心畲 恭王府博物馆藏(图2.1) 楼阁—画稿28之12 溥心畲 恭王府博物馆藏(图2.2) 画稿不是画家自我临摹的临本，而是绘画生成过程中的阶段性形态和创造形象的基础。这幅作品的点景楼阁有神似之处，这种形象的神似称为具有同稿关系；画面的内容选取、组织形式、图像的样式等方面也采用了相近的处理手法，这称为章法布局具有同稿关系。这种同稿、同构关系反映出画家对画稿的“内化”过程，当一种典型形象或典型布局成熟后，画家在创作中便可对其进行灵活的运用，即“胸有成竹”的道理。

墨笔山水轴 溥心畲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图3.1) 山水条 溥心畲 湖南博物院藏(图3.2) 此组作品分别创作于1948年和1946年，可进一步说明在同稿、同构基础上，溥心畲生成、表现不同主题作品的情况。《墨笔山水轴》上题“鱼戏多深潭，蝉鸣但故林”，刻画了多个点景屋舍，一丘之隔便是无尽江岸，连接远方，表现的是理想中的故乡村居；《山水条》中，画家引导观者经过板桥，行至深山，方得见友人位于瀑布绝壁旁的居所，画上题“路寻丹壑断，人近白云居”，表现的是深山探幽访友的情景。

访幽图 溥心畲 湖南博物院藏(图4.1) 溥心畲画稿36 恭王府博物馆藏(图4.2) “松泉高士”是中国绘画的经典题材，指向林泉、幽居等主题，观者此类作品，使人如若亲临自然，心旷神怡。这组画、稿均为松泉高士题材，但溥心畲做了丰富多样的组织和表现。从这个角度来看，画稿在特定题材绘画生成过程中也对艺术表现的展开发挥着重要作用。

展览的第二单元“千里意未足——溥心畲的写生性画稿”设置在乐道堂东配殿。展览聚焦溥心畲的写生性画稿和相关作品，以溥心畲与千里马的旧事为引，讲述溥心畲寻千里马之梦和行千里人生路的感悟。

读书、行路，是中国绘画实践过程中要在绘画以外所下的功夫。如此，方能“胸中脱去尘垢，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鄂鄂。”(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国绘画的写生，本指写万物之生意。广义上说，包含了对于天下万物的观察与体悟。行路、行旅、行人生之路，正是画家写生的途径。溥心畲的写生性画稿中体现了传统和时代因素的叠加，有强透视的形象捕捉，具有速写意味的动态记录，有结合际遇情境的生动

「汲古高歌——恭王府博物馆藏溥心畲画稿研究展」赏析

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



图1



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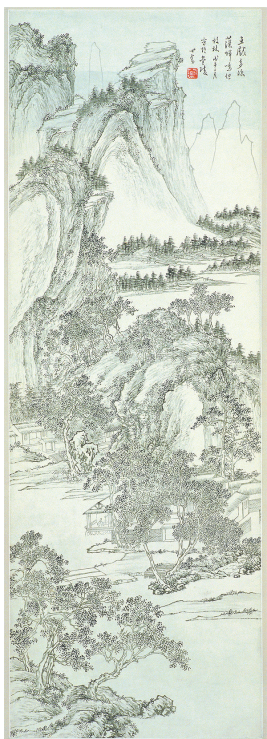


图3.1



图2.2



图3.2



图4.1



图4.2

组合，也有肖像写真类型的传神描绘。

溥心畲画稿35 恭王府博物馆藏(图5) 溥心畲对马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文集著述中，多见马种、马性和画马要领的记录。此作品可能是一件用于记录马体各部位细节的画稿，结构准确、神态生动。他曾说：“韩幹画马，不师陈因，良有以也。”唐代陈因画鞍马，得到唐室推崇，唐玄宗令画家韩幹效法陈因。韩幹答：“臣自有师。今陛下厩中皆师也。”这种以造化生灵为师，而不落前人窠臼的观念，为溥心畲所重视。

紧扣展览主题的第三单元“修绠与心胸——溥心畲对马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文集著述中，多见马种、马性和画马要领的记录。此作品可能是一件用于记录马体各部位细节的画稿，结构准确、神态生动。他曾说：“韩幹画马，不师陈因，良有以也。”唐代陈因画鞍马，得到唐室推崇，唐玄宗令画家韩幹效法陈因。韩幹答：“臣自有师。今陛下厩中皆师也。”这种以造化生灵为师，而不落前人窠臼的观念，为溥心畲所重视。

20世纪初溥心畲居于恭王府时，府中收藏的历代书画名迹仍十分可观，唐代韩幹的传世名作《照夜白图》即在其手中。画稿右上部即为溥心畲所临《照夜白图》。溥氏绘画以临习、借鉴古人名迹入手，起点颇高。谈及学古，他曾说：“有些人认为我不创作，其实不然，我没有一幅画没自我精神，也没有一幅画像奴隶般地



图7.1



图7.2



图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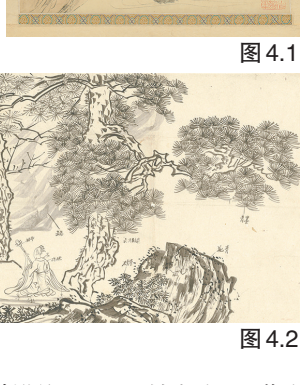


图8.2

白云飞瀑轴 溥心畲 首都博物馆藏(图8.1) 山水立轴 溥心畲 湖南博物院藏(图8.2) 两件作品均以“树向白云得，人从瀑布来”两句为题，内容一为山居，一为园林；一为山间野逸，一为人为修造。溥心畲用不同的画面表现相同的主题内容，用不同的画材、场景来营造同样的画境与诗境，诗与画在溥心畲创作中的呼应和互动，体现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绘画的把握和理解能力。

溥心畲以“藉古人骨架，发挥自我笔墨精神”为门径学习古人，其画稿所体现的有关“继承—创造”的自觉和方法，以及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展览试图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其创作中对中国文艺传统的有效继承和发扬，有着对当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启示；二是其在时代剧变的背景下，深挖传统，形成与传统以及近现代文艺方法综合关联的高水平艺术成果，对当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具有参考价值。如何处理传统与时代发展的关系，其中经验或可作为借鉴。

(供图: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 湖南博物院 首都博物馆 北京艺术博物馆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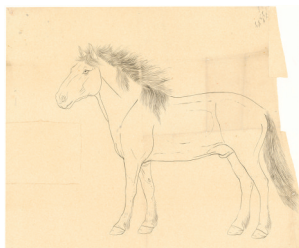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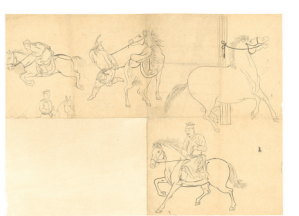


图6



图7.1



图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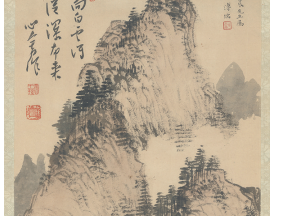


图8.1



图8.2

6月25日，由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闵行区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大汉未央——汉代王室精品文物展”在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开幕，128件(套)河北出土的汉代精品文物，跨越千年，风华宛然，为长三角公众献上一场汉风文化盛宴。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王朝，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是一个承前启后、蓬勃向上的时代，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两汉时期，在今河北省曾分封过燕国、赵国、中山国、河间国、常山国、真定国等数十个诸侯国，其中中山国诸侯王墓的考古发现最为丰富，著名的有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山怀王刘修墓、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等。这些墓葬规格高，出土文物众多且精美，甚至不乏国宝级重器，一器一物无不彰显出我国汉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极富浪漫色彩的精神世界与统一多元的时代风貌。

王封中山 赫赫宗藩

汉初，高祖刘邦鉴于秦朝“孤立之败”，大封宗室与功臣，实行郡国并行的政治制度。随着政权的稳固，异姓诸侯王被逐步消灭，众多刘姓子孙被封为王，以藩屏皇室。当时，大的封国“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有很大的自主权。“七国之乱”后，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势力被极大削弱，但依旧发挥着拱卫中央的重要作用。汉代中山国就始封于“七国之乱”平定后的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

“中山”国名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河北中西部活跃着一个由狄族鲜虞部建立的小国，因都城之中有山，故称“中山”，一度颇强。赵、燕是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汉代中山国都于卢奴(今河北定州)，北界易水，南临滹沱，西倚太行，富饶广阔。盛时下辖14县，16万户，人口66.8万，在当时20余个诸侯国中人口数第二，县数第三。中山王世系，西汉共历十王，东汉七王，其间虽存在多次断续，但绵延三百余载，几乎与两汉相始终。

汉室诸侯王地位显赫，生而钟鸣鼎食，死后金玉相随。历代中山王陵出土了大量彰显王室地位的车马器、兵器，反映奢华生活的宴饮、养生等各类精美文物。这些器具以铜器居多，多采用鎏金银、错金银工艺进行装饰，兼有金银器、漆器等。透过这些精巧绝伦的文物，得以窥见汉代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以及郡国并行制下汉代王室的赫赫威仪。

马车在古代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就设有专门的车马房，共有随葬马车10辆、马29匹，有平时出行乘坐的安车、狩猎时使用的猎车、轻快简便的轻车等。马车整体可分为车轮、车轴、车轳、车衡、车厢、车盖六部分。车轳(wei)套在车轴的两端，用来加固轴头，一般与车轳配合使用。铜质车轳商代便已经出现，一直流行到西汉前期，后逐渐被铁质车轳取代。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一对铜车轳(图1)，长5.3厘米，里端径6.3厘米，末端径3.7厘米，器身错金银纹，装饰繁复华丽，是汉代车轳中的精品。



图1

承弓器，装配于车厢前方居下位置，是用于安放弓弩和帮助张弩的支架。其用途长期以来不甚明确，原据河南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中其出现在弩臂前端左右两侧，被认为是装在弩臂前端承弓之用，而定名为“承弓器”。直到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的发现，为确定承弓器的用途、位置提供了准确依据。居延简中所称“承弩”，可能即指此物。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一对错金银铜承弓器(图2)，通长12.3厘米，以金银错云雷纹和兽首细部，工艺精巧，是难得的汉代手工艺品。



图2

既寿且康 长乐未央

汉代人主张“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孝之至也”，故厚葬成风，许多诸侯王陵随葬品着丰富，“凡生人所用之器，无不可为从葬之器”。作为汉代诸侯王的代表，中山王及其家族墓中出土的生活日用之器一应俱全。众多做工精湛、装饰华美的珍贵文物，既是当时工艺制作水平的直接证明，也反映出中山宫廷觥筹交错、歌舞升平的生活场景，以及汉代社会经济繁荣的历史事实。

中山国墓葬出土的文物中，用于烹饪饮食的为一大宗，如满城汉墓就随葬有此类器物千余



图3

汉世风华 昭昭未央

大汉未央——汉代王室精品文物展

焦鹏航

件，包括铜器、陶器、漆器、玻璃器等。其中，铜制器皿数量众多，制作精良，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银鸟篆文铜壶(图3)，高44.2厘米，腹径28.5厘米，周身用纤细的金银丝镶嵌出鸟篆文字和动物纹带，似书似画，华丽非常。壶盖有文字12字，壶身32字，分别释读为：为荃盖，错书之，有言三，甫金馗(lái)；盖圆四背，以尊成尊，盛况盛味，於心佳都，滄(yán)於口味，充同血肤，延寿却病，万年有余。大意为这尊贵完美的壶，饰有华丽的文字和花纹，盛酒盛水俱佳，饮酒可通血润肤，延年益寿。

熏炉是一种燃香之器，最迟战国时已经出现，至汉代颇为流行。其形制可分为盖豆形、博山形、行炉形、鼎形、鸟形数种，质地有陶质、铜质等。早期的熏炉多为豆形炉，造型

华丽的博山炉大概在西汉中期出现。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绌墓出土的骑兽人物博山炉(图4)，通高32.3厘米，底座径22.3厘米，底座为一骑兽力士，炉盖分上下两层，上层铸山峦和云气，山间有虎熊出没，出人兽搏斗和人驾牛车的场面，下层铸龙、虎、朱雀、骆驼与草木、云气纹，形象生动逼真，下层炉盖铸骆驼而缺四象之一的玄武，是较为少见的例子。



图4

不朽如玉 长生无极

玉器作为礼器、瑞器、武器、配饰等，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在诸多重要的文化遗址中，经商周时期演变发展，至汉代形成了一个用玉高峰，广泛应用于礼仪、装饰、随葬等方面。汉代祈求长生及升仙观念浓厚，认为“金玉在九窍，则人为之不朽”，相信玉器可保持尸身不腐，帮助灵魂升仙，盛行以玉敛葬。考古发现的汉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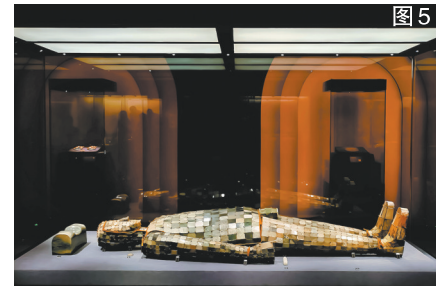


图5

诸侯王、列侯等贵族常身穿玉衣，头倚玉枕，手持玉握、眼耳鼻等身体“九窍”以玉封堵，周身还有玉佩相伴。中山王陵出土的众多玉器触目琳琅，不仅是研究汉代玉制度的重要参照，也展现出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高峰。

玉衣，又称“玉匣”“玉柩”，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所用殓服，主要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分别以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织物等连缀而成。汉代玉衣的使用有相应的规制，西汉时期对诸侯王玉衣的缕质未作严格限制，刘姓诸王还可以使用金缕。东汉使用制度相对严格，皇帝用“金缕玉柩”，诸侯王、列侯、公主等“玉柩银缕”。东汉中山简王刘焉的玉衣长1.8米，为鎏金铜缕玉衣(图5)，较为特殊，其等级似高于银缕玉衣。刘焉是光武帝刘秀与皇后郭圣通最宠爱的少子，历经四帝，备受恩荣，可能特赐其鎏金铜缕玉衣。

《周礼》载“以玉作六器”：璧、琮、圭、璋、璜、琥，以礼天地四方。玉璧为六器之首，是古代最重要的玉礼器之一，除祭祀外，还用于朝觐、佩饰、丧葬等。

汉代墓葬出土的玉璧数量众多，是葬玉与礼玉的结合。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的透雕双螭纹玉璧(图6)，高25.5厘米，宽19.9厘米，厚0.7厘米，整体由青玉雕成，两面饰谷纹，肉(即璧体)、好(即孔)边缘各刻弦纹一周，上端透雕双螭纹，雕琢极为工致，是罕见的精品。

为了到上层世界后仍能富贵长乐、永享荣华，汉代社会上层不仅营造如宫殿般的墓室，将生前喜爱的珍贵器物带入地下，还专门制作了各类明器随葬。明器，即仿制现实事物专门用于随葬的“冥器”，在汉代十分盛行，以陶器为主，兼有金属、石器等其他材质。

汉代陶制明器大量模拟生活场景而加以缩放，有仿青铜、漆木的容器，有仓、灶、井、楼阁等建筑模型，有鸡、犬等动物，也有家仆、百戏等不同职业、身份的陶俑。西汉时还流行红白双色为主的仿漆器彩绘明器，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一件彩绘陶厄(图7)，通高13.3厘米，口径11.6厘米，纹饰精美，做工细致，造型与现代茶杯颇为类似。

汉代文字瓦当中常见“千秋万岁”“长生无极”“与天无极”等吉祥语，表达着当时人们对生命延绵的祈愿。汉代墓葬中这些精美的随葬器物与规模宏大的王陵相结合，构筑出汉代人所想象的彼岸世界，不仅体现了他们对生与死、现实与冥世的深刻思考，也为今人理解汉代丧葬思想、灵魂观念及精神信仰提供了重要物证。



图7